

美协重建

(上接10月23日4版)

美协副主席就有九位

1974年国庆前,我从拉萨回到上海,本以为自己由中国画院派出去,理所当然回到画院,没想到却被安排去了上海美术创作办公室,简称美创办。美创办原来叫上海美术作品展览会筹备组,负责全市美术创作的组织和展览,由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将之更名。更名前,筹备组还组织了一个内部画展,展出林风眠、刘海粟、唐云、程十发等画家的180多幅作品。

美创办是新成立的机构,市革命委员会很重视,调人进去,要他们同意。和我一起到美创办的,还有陈秋草等人,我们在黄陂北路226号办公,那里是上海美术展览馆的分馆。以前,我和陈秋草是美协的同事,他做展览部主任,我在会员工作部。现在,美协没了,美创办是临时机构,成员东拉一个,西扯一个,调我过去,因为知道我熟悉上海画界情况,对举办展览有经验。

不久,市总工会的吴林生被派来美创办做主任,上海人美社的陈强当副主任。两个领导都不错,也懂业务。美创办成立后,马上开始工作,实际是代行美协的职能,组织美术作品、筹划展览、辅导工人业余创作,都是以前美协的事儿,也都是我轻车熟路的活。

除了两位主任,美创办的工作人员很多是以前美协的人。此时,工宣队也没了声音,不再当道执政。大家以前在美协做啥,现在还做啥,彼此都认识,抬头就能看到昔日同事,只是换了个单位名称。

1975年又在混乱中度过去了,其间美创办也搞了几次展览,引不起大家兴趣,应付而已。我常常有一种错觉,以为回到了以前的美协。其实,人们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,绝大部分人由最初的狂热,到迷茫,逐渐回归正常,渴望正常。时间久了,哪怕最初被蒙蔽的人都感觉出来,太多行为不符合正常逻辑。

1976年10月,全国一片欢腾。11月,工宣队撤走,大家知道一切将正常起来,恢复到社会运转的正常轨道中。

我们在美创办工作,朝九晚五,看似平静,其实内心知道,大调整已经开始,马上就会轮到美术系统,大家都在等待,等待北京,要看中国美协怎么办,我们的名头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。当时,不止美术领域,各界都在看北京,看中央的态势和风向。

1978年5月,上海美术创作办公室撤销,吴林生、陈强调走,美术家协会开始恢复活动。美创办撤销到美协改选期间,吕蒙和蔡振华回来主持工作,上级宣布他们是召集人。实际上已经是美协的组织机构和方式,只是缺少一个正式的程序。

1980年8月27日,中国美术家协会上海分会第三次会员大会在上海文艺会堂开幕,距上一次会员大会,已经整整过去了18个年头。唐云主持会议,他是第二届常务理事。沈柔坚作工作报告,蔡振华作会务报告。台上台下,都是熟悉的面孔。重要的是,会上选举产生了第三届理事会,我也入选。一团散沙的美协重新汇聚起来。

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投票的统计单。大家推举林风眠先生为主席,林先生早在1977年已经去了香港,并没有回来参会,但与与会者还是将票投给了他。



1978年,胡振郎和爱人王桂珍在上海南市区照相馆合影,背景为夫妻俩从家中带去的胡振郎作品。

副主席沈柔坚、王个簃、张乐平、颜文樑、刘海粟、唐云、关良、谢稚柳、吕蒙。蔡振华任秘书长,陈秋草、张充仁任副秘书长。

这一届美协副主席就有9位,人数之多史无前例。比起美协的名家济济、人丁兴旺,书法家协会的力量稍显单薄。当时,百废待兴,各界都需要振兴和充实。当时,组织上考虑过将谢稚柳安排到书法家协会当主席,认为不失为一种好选择,而且谢先生书法好,懂鉴定,地位也高,适合这个位置。后来,不知为啥,谢先生还是留在了美协。

谢先生在美协,我便有很多接触的机会。外界传闻谢先生恃才傲物,不好打交道。我接触几次下来,发现并非如此。他只是对不喜欢、不投缘的人比较轻慢。

金山农民画

蔡振华在会上作了报告,他提到:金山农民画是上海群众美术的一枝鲜花。鉴于金山农民画深受外宾欢迎,经文化局及市外事办公室同意,开始向外宾出售农民画。这样一来,不仅国内声名鹊起,还一举走上了国际舞台并大放异彩。

金山农民画确是在那时发展起来,也与美协辅导群众美术创作有关。干什么事都靠人,说到金山农民画,就要提到吴彤章。20世纪70年代初,吴彤章从虹口海军东海舰队复员,回到金山县枫泾镇,在文化馆任美术辅导员,负责群众美术工作,因此与美协有工作往来,刚好和我对口。他本人也善画,是美协国画组成员,我是副组长。各种因缘,加上接触频繁,一来二去,我们熟悉起来。他在枫泾时,发现农民陈富林等人很爱画画,也能画几笔,就把他们组织起来,一起创作,并不时将相关情况与我沟通。

起初的农民画创作很简单,完全是自发形式,线条简约,色彩单一。后来,

吴彤章来上海美协说了这个情况。美协重视起来,发现已经小有规模,形成了四五个人的创作小团队。我第一次见到陈富林时,也觉得他有能力、有潜力,于是与吴彤章一起辅导他。之后,我回来汇报。支部书记张云聘、理论部主任吴景泽都觉得是好事,应该支持。

上海每年有一次群众美术作品展,群众艺术馆本来就是抓群众美术活动的。有一年的展览,群艺馆和美协合作,重点推出金山农民画,金山农民画评上了奖,影响力大增,开始登上大雅之堂。

那时候,农民画已经火热起来,文化馆办了辅导班,群众艺术馆来管理,辅导农民画的专家都是美协的会员。群艺馆管群众,美协管专家,一直惯性延续下来。农民画从业余发展到专业水平,有赖美协打下的基础,尽管后来美协没了,但它在农民和画家间架起桥梁,作用始终在。

1974年秋天,我到美创办后,其中一项工作就是继续支持金山农民画。我和施选青、朱国荣三个人一起到金山,将金山农民画的情况整理成文,在《美术》等报刊上宣传,进一步扩大影响力。之后,农民画送去北京展览,在中国美术馆,引起了华君武的关注,这才有机会去布鲁塞尔展出,走上国际舞台。

说到施选青和朱国荣,他们是我在美协工作期间的搭档。1977年下半年,两人调来协助我工作。

我与施选青早就认识。1973年,我在黄山茶林场四队采风,施选青是女知青,在五队。后来,美协恢复,积压了很多工作,需要人手。工宣队的负责人说:文化局回来一个知青,叫施选青,能写能说,各方面都不错。好几个单位都想要她。如果美协需要,可以优先考虑。施选青就是这样到了美协。

朱国荣是黑龙江知青,回城后在上海师范学院美术系读书。老师黄若舟先生,是美术系主任、老教授。毕业分配时,黄教授向蔡振华推荐他,朱国荣便到美协工作。

施选青和朱国荣到美协后,入职理论部,我也在理论部工作。我们三个一起,我是老美协,熟悉美术界情况。1982年,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《中国绘画故事》,就是我们三个人的合作作品。当时,人美社的主编是胡海超,人美社恢复职能,策划出版第一本书,他向我约稿。我带着施选青和朱国荣,一起完成创作,作者落三个人的名字。他们俩刚参加工作不久,就有成果问世,非常高兴。

施选青下乡耽搁了学业,回城后很多地方都需要学历,她就想读个夜大学,拿大专文凭。当时,轻工业专科学校办了美术夜大学,她比下来,认为适合自己,但和报名资格有差距。她和我交流想法。我就给她画了张山水画,让她拿着去报名。还要相关证明,美协不好开,她也不太想麻烦单位。我就从黄浦画院给她开了证明,她去报名很顺利。

后来,施选青高兴地拿到了文凭。她一如既往地认真工作。在美协,大家对她的评价一直很好。朱国荣为人忠厚,会画画,擅长写作,出版过几本书。组织上想发展他入党,派我做他的联系人。他入党时,我是他的介绍人。

搬回延安西路238号

前已叙述,自美协被封,我们就已不在延安西路238号办公,工作人员逐渐分散到各个机构,大部分转移至南京西路的上海美术展览馆办公。展览馆原来是美协的下级单位,归美协展览部管属。之前,美协基本就这两部分,机关在延安西路,展览在南京西路。

后来,百废待兴,名正才能言顺,首先开始恢复各个机构名称,包括设置、职能、办公场所。美协划归文联管理,美术展览馆的上级机构是文化局,文联和文化局属于平级单位。因此,美协和展览馆就要分家。全市的展览场馆都划归到了文化局,算是一种同类资源的整合。幸好,这次调整并非不顾实情的机械分割,考虑到美协的展览职能,应该有自己的展览场地,上级在黄陂北路美术馆边上选择了一块场地给美协。

归还了展览馆,美协搬回延安西路238号,但延安西路也不再是原来的面貌。之前只有美术家协会、音乐家协会、摄影家协会等四家单位,美协一枝独大,占据一半办公场地。后来,文联机构发展,新增了很多单位,有将近十个,都集中在大院办公。美协的办公面积受到挤压,之前腾出来的地方,还回不到原来的一半,幸好黄陂北路还有一处展览空间,可用于调剂。

20世纪80年代,沈柔坚从文化局退休,重回美协,担任副主席兼党组书记,他和吕蒙就在黄陂北路办公,展览部也在黄陂北路。我们偶有活动也去那里,遇到开会或者学习,就两边动。黄陂北路226号二楼,后来改造为上海美术馆画廊,500平方米,成为美协举办美术展览和美术学术交流的场所。

美协的重建不止一次会议、一套人马、一幢房子,还有很多具体工作,零零碎碎,是个逐渐恢复的过程。我心里一直怀念刚毕业来上海时,初入美协的光景。青春年少,意气风发,每天有干不完的活,用不完的精力和能量。此后十年,我老了十岁,创作旺盛的最佳时光,随风一般流逝。其间,我以画人物为主,到改画山水,不知不觉完成了这个转型。

胡振郎 口述 邢建榕 魏松岩 撰稿